



解读巴别塔 ——一个概念的文化史

JIEDU BABIETA
YIGE GAINIAN DE WENHUASH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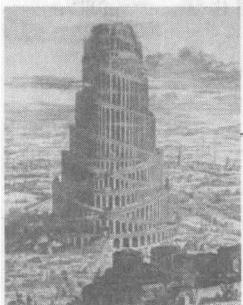


潘道正 著

 安徽教育出版社

K103/62

2008



JIEDU BABIETA
YIGE GAINIAN DE WENHUASHI

解读巴别塔

——一个概念的文化史

潘道正 著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解读巴别塔：一个概念的文化史 / 潘道正著.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5

ISBN 978 - 7 - 5336 - 4974 - 6

I . 解… II . 潘… III . 文化史—研究—西方国家 IV .
K1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69307 号

责任编辑：张丹飞

装帧设计：朱 锦

出版发行：安徽教育出版社

地 址：合肥市繁华大道西路 398 号

邮 编：230601

网 址：<http://www.ahep.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安徽创艺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合肥朝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650 mm×960 mm 1/16

印 张：18.5

字 数：270 000

版 次：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2 000

定 价：34.00 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我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电 话：(0551)3683078

序

巴别塔是圣经里的著名典故，它的发生背景是挪亚洪水过去不久，天下人口音相似，语言相通，当时大伙儿来到示拿地的平原上面，准备修一座城池，筑一方塔。对此《创世记》记述说，众人有心把塔修得通天高，以传扬他们的好名声。不料想上帝心里犯嘀咕，寻思他的子民要是修成这个通天塔，那就无所不能了。乃变乱众人口音，使言语彼此不通。结果通天塔的工程不了了之，天下人分散各地，开始有了自己的言语，所以那城，也就名叫巴别。

“巴别”(Babel)即希伯来语中的“巴比伦”，原义为“通向神的大门”，但是在以上希伯来文化的语境中，“巴别”的意义就变成了“变乱”、“混乱”。上帝不愿意人类有一样的语言，乃至无所不能起来，是以变乱人类的语言，使各言其言，无以沟通，这样人类也不至于有朝一日不知天高地厚，来同上帝一争高低。故这里的根本问题是语言。建造巴别塔，由是观之，是以语言为契机，喻示了一种劳而无功的非分之想。而且，后来做过“巴比伦之囚”的以色列人，对巴比伦这个“大城”，肯定也不会有什么好感。

巴别塔在现代知识体系的文化内涵，无论如何都是意味深长的。不妨说，它就是西方社会的一个文化征象，凡语言、哲学、政治学、伦理学，乃至建筑技术、帝国主义、都市化、后现代、生活形象、种族分化，以及说到底对人类傲慢的谴责，都在这里追根溯源寻到了家园。巴别塔最初只不过是一座塔。一座塔何以终而变成一个无所不包的文化“征象”，似乎也是说来话长。潘道正的《解读巴别塔：一个概念的文化史》，就是通过梳理多不胜数的大量西方文献，围绕巴别塔的原型，显示了一脉每每被人忽略过去的文化史。

比如我们至少可以从巴别塔的巴比伦语境和犹太语境，来考察该塔的缘起。作者告诉我们，就巴比伦语境来看，早在公元前三千

多年前,巴比伦文明就已经兴盛于西亚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是为人类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尽管巴别塔的故事仅见于圣经的记述,而且史学家们并没有发现确凿材料证明巴别塔就是巴比伦,但自巴别塔成为文化考察对象的那一刻起,它就和巴比伦难解难分了。这不仅仅是因为两个概念存在着语源学上的相似,更因为辉煌的巴比伦的确建有许多雄伟壮观的高塔。古希腊的史学之父希罗多德游踪曾达巴比伦,为后人留下了第一手资料。据希罗多德记载,的确有座伟大的巴比伦城,城墙坚固,里面建有旋梯型通天巨塔,以作神庙之用。圣经中同样留下了许多关于雄伟“大城”巴比伦的描述。而现代考古学则似乎印证了希罗多德的记录,在已经破译的巴比伦文明留下的泥板文书和碑铭中,多次提到巨型塔的建造。随着历史文献的日渐丰富,一座通天塔赫然复现在广袤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气象万千,象征着人类文明的无穷创造力。时至今日,无论这巴比伦塔同圣经中的巴别塔到底有没有关系,甚至巴比伦塔是否真的存在,都已无关紧要,因为在想象的天地里,巴比伦塔连同古老辉煌的巴比伦文化一起,早已融进了巴别塔的历史概念。巴比伦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构成了巴别塔这个文化符号的物质内容。

就犹太语境来看,犹太民族同巴比伦人一样,创立过人类最早的文化遗产。公元前约十世纪的大卫王时代,是犹太文化几乎是转瞬即逝的极尽辉煌时期,大卫之子所罗门王不仅因为智慧,更因为他好大喜功建造了富丽堂皇的圣殿和宫殿而名扬后世。但是在这辉煌时期之前和之后,犹太人大多数时候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他们不可能有充裕的时间来造通天塔,所罗门的宫殿只是昙花一现,圣城耶路撒冷也始终是一副破败的景象。变动不居的环境迫使犹太人生存智慧的取向不是物质,而是精神,这也决定了犹太语境独特的文化特征:精神上的优越感和浓厚的道德说教气质。所以比较来看,巴比伦语境中,历史轻易忽略了与塔相关的一切悲哀和不幸,唯突出了塔的壮美,那是巴别塔的物质文化维度壮美。反之在犹太语境中,塔有多么奇伟显得无足轻重,道德上的善恶评判取代审美的观照,成了诠释巴别塔的主要维度。

因此《创世记》背靠犹太语境来读巴别塔的记述,塔是什么模样

变得无关紧要，巴别塔故事本身成了一个留下无穷阐释空间的经典文本。虽然，这个故事本身的结构远谈不上严谨，比如有人提问，人类建造巴别塔为自己扬名何错之有？上帝既然是无所不能，又何必惧怕？这些问题言人人殊，所见各不相同。巴别塔故事出现在《创世记》中，此后《旧约》再也没有提起过。但在犹太专事讲解经书的教师拉比的诠释传统中，巴别塔故事被具体化、道德化，演绎成了罪与罚的故事。这个罪首先是骄傲之罪。骄傲的由来显然有其现实根源。犹太人在流徙的过程中饱受其他民族的欺凌，更有过作“巴比伦之囚”的惨痛经历，对巴比伦无疑是深恶痛绝的。《旧约》经常提到巴比伦，称之为“大城”，这个大城虽然被认可是雄伟壮观，却被犹太人骂做“大妓女”。有趣的是，犹太人诅咒巴比伦等异族人的理由，主要不是自身受到了残酷迫害，而是这些异族人无视上帝的骄傲。很显然，犹太人自豪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自觉不自觉地就在世俗世界代表上帝发声，扮演起了道德审判者的角色。如是巴别塔的“塔顶通天”，同雄伟的大城巴比伦满可以对号入座。塔顶通天的巴比伦城象征着统一政治、文化、宗教的强权。对于散居在外的犹太人来说，异族人的强权和骄傲之罪，就成了巴别塔最核心的象征意义之一。

回到语言变乱的话题。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在他的《巴别塔》一文中，更从语言说起，由此提出了翻译不可能的命题。德里达首先提出的问题是，建构和解构巴别塔的，是哪一种语言？对此他回答说，建构和解构巴别塔的是这样一种语言，其间“巴别”这个专有名词可以给一片混乱地译成“变乱”。而“巴别”既然是专有名词，那么理应是不可翻译的，我们浮想联翩，我们自以为是把它转述出来，转述的结果就是一个普通名词“变乱”。德里达发现伏尔泰在他的《哲学词典》里，已经对此表示了惊讶。他转引了伏尔泰的如下文字：

我不明白为什么《创世记》说“巴别”(Babel)是指变乱，因为 Ba 的本义是指父亲，Bel 则是指上帝；巴别指的是上帝之城，指的是圣城。古代人如此来命名他们所有的都城。但是毋庸置疑，无论是因为建筑师把塔造到八万一千犹太尺那么高后就不知所以了，还是因为到那时众人的语言就变乱起来了，巴别

的意思就变成了变乱。很显然，从那时候起德国人就听不懂中国人说话了；因为根据学者波夏尔(Bochart)的说法，汉语和高地德语最初分明就是同一种语言。^①

这里伏尔泰自然是开了一个玩笑。但是伏尔泰不动声色的揶揄在德里达看来，是显示了“巴别”这个词的真正的意思，那就是它不仅仅是一个不可传译的专有名词，而同时也是一个关涉某一类泛指的普通名词。这个普通名词指的并不仅仅是变乱。或者说，它不仅是指语言上的混乱，甚至塔造不下去时的不知所以状，而且还是作为圣父的上帝之名。故巴别是混乱之城，也是圣父上帝之城。上帝以他的名字开辟了一个其间人无以沟通理解的公共空间。只有专有名词，理解无有可能；没有专有名词，理解同样无有可能。而这不可能的根源就在于上帝，上帝给万物命名，它理所当然也就是语言的本原。巴别(Babel)是组合名词，如伏尔泰语所见，Ba是父亲，Bel是上帝。所以巴别乃是上帝之名，巴比伦的名称也是上帝的名称，是为圣城。语言本来是上帝赐给人类的礼物，上帝以“巴别”为“变乱”，变乱了巴比伦城的语言，也变乱了整个儿的人类的语言，所以在德里达看来，上帝是语言的本原，也是变乱的本原。

但是语言的变乱也是语言的开始，正是从这里开始，各地的母语起步了。故而，上帝是通过把自己的名字强加给造塔人，开启了巴别塔的解构，也开启了普世语言的解构。这样来看，上帝既显示了翻译之必须，同时又禁止了翻译。这就像因误译而约定俗成的上帝之名“耶和华”，其希伯来原文中的表达方式 YHWH，原是无以发声的，因为里面根本就没有元音。所以即便更正“耶和华”，改称“亚卫”，也还是不得要领。而如一些文本译上帝名为“雅威”者，虽则又“雅”又“威”，却是刻舟求剑，南辕北辙，同上帝名不可名的宗旨背道而驰了。或许我们还可以说，上帝遣散造塔人众也不全然是惩罚，因为人们由此可以来按照自己的梦想获得自由和发展了。巴别塔未倒塌之前，唯一通行的语言是上帝的语言，人类盲目效法上帝绝对正确的语音，犹如鹦鹉学舌。巴别塔的倒塌促使语言分化，民族

^① 见德里达：《巴别塔》，见《宗教行动》，第 105 页。

国家和民族身份得以形成，巴别塔故事这样来看，就是开启了人类文化的历史。

本书作者潘道正 2003 年考取南开大学哲学系美学专业博士生，我是他的导师。读书期间，潘道正得到了香港道风山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的奖学金，并且一度到香港的神学院里研修神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他选定了巴别塔文化史作为他的博士论文。他的论文里有哲学和美学的影子、有宗教的影子、还有广义上的文化研究和文学批评的影子，这些影子本身或者不成体统，但是汇合起来，就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在神学院期间，潘道正日以继夜阅读、复印和翻拍有关英文资料，同学之间传为佳话。我总觉得，一部西学著作，使用外文材料来写，应当是基本的要求。可以说潘道正在这一方面是做得相当出色的。他的中文和英文都堪称流利，兼之好学多思，勤奋不辍，所以他的博士论文辛苦出来，同行专家无一例外都给予很高的评价。如今承蒙安徽教育出版社的资助，令他悉心修订下来，攀援着巴别塔的罪与罚的线索，娓娓追溯出一个知识体系，叙写出一部特殊的文化史。相信作者的努力，是可以具有填补空缺的意义的。是为序。

陆 扬

2008 年 2 月 16 日于复旦大学

目 录

导 言	/001
第一章 巴别塔的建造	/015
第一节 历史：巴比伦建筑的骄傲	/016
第二节 文本：希伯来文学的经典	/031
第二章 上帝降临的主题	/047
第一节 骄傲之罪	/048
第二节 变乱之罚	/061
第三章 基督的拯救	/073
第一节 斐洛隐喻的解读	/074
第二节 言成肉身的救赎	/086
第三节 尼西亚教父的诠释	/096
第四章 统一的梦想	/107
第一节 中世纪巴别塔绘画	/108
第二节 寻找巴别塔之前的语言	/122
第三节 创造完美的人工语言	/137
第四节 翻译：从本雅明到德里达	/150
第五章 强权的象征	/165
第一节 马丁·路德：教皇专制	/166
第二节 卡尔·巴特：纳粹独裁	/176
第三节 罗兰·巴特：话语权威	/190

—— 目录 ——

第六章 上帝缺场的叙事	/201
第一节 个人主义的悲剧	/202
——安德森的诗剧《巴别》	
第二节 孤独的悲剧	/215
——博尔赫斯的小说《巴别图书馆》	
第三节 骄傲的悲剧	/226
——艾科的小说《玫瑰之名》	
第四节 沟通的悲剧	/238
——伊纳利图的电影《巴别塔》	
第七章 巴别塔的现代阴影	/251
第一节 网络:看不见的巴别塔	/252
第二节 911:巴别塔上的悲剧	/266
002 参考文献	/279
后记	/285

导 言

“巴别塔”典出《旧约》，故事已经讲了数千年，但从未像现在这样意义非凡，因为这个时代比任何时代都更容易让人想起巴别塔，是真正的“巴别代”。1996年，美国学者雷诺撰文《盒子和新巴别塔》(Boxes and the New Babel)指出，受启蒙主义影响的一代人拥抱了禁欲主义、世俗化、工具理性，相信不管世界怎样纷乱，都可以“识别、拣选、重组、分类、归档，‘装盒’”，是“盒化”的一代，但随后就是“巴别代”：

这一代结束见证了另一代的开始，即巴别代。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没什么是可相信的，他们的理解简直不可理喻，他们把自身无限地还原为环境的产物，这时就没什么能（或可）说、写，甚至理解的了。如果某些作家相信，怀疑论相对主义的膨胀将发展到对“理解”之信念进行否定的程度，那么交流将成为一个令人厌烦、纠缠不清的诠释混乱之网络、被误解符号的广大区域、“文本”、次文本、伪记号。启蒙之梦的结尾是巴别噩梦，第二次堕落。^①

在雷诺看来，对“理解”本身的质疑，使得“变乱语言”的惩罚达到了极致。现在，“变乱”绝不仅仅只是指由一种语言分化成许多种语言，造成了沟通的困难，还指同一语言内部，随着思维的不断细化，意义无穷衍生，出现了理解的障碍。为了交流，人们创造了庞大的词库，重新建立了一座巴别塔，“所有这座巴别塔的居民将说同样

^① Samantha du Raeno, ‘Boxes and the New Babel’, *This Soup Is Ready To Serve*, Cambridge, October 1996.

的语言,然而他们仍然不能相互理解。他们所说的每一个词都将被赋予太多而不是太少的意义,因此也就没有意义”。^①“巴别”(Babel)真正成了喋喋不休的“胡言乱语”(babble)。巴别塔诅咒像是泥沼,越是挣扎陷得就越深。

雷诺是过于悲观了点,相比之下,社会学家乔纳森·克兰(Jonathan Crane)更看重巴别塔的积极意义。2000年3月,在美国科罗拉多泉市召开的“文学、传媒和社会学的二十世纪(和千年之末)印象”年会上,克兰宣读了论文《巴别塔和传播技术》,他指出,当今时代日新月异,科学技术的发展迫使说不同语言的人们走到一起,交流就成了一件历史性的大问题。与此同时,交流的障碍同样存在于使用同种语言的亲朋好友之间。在这个艰难的时代里,巴别塔就是“一座灯塔”,当面对时代挑战的时候,巴别塔故事提供了一个了解我们自身所处位置的方法,而当世界在响亮的语言的洪流中倾毁的时候,当不能把握中心的时候,巴别塔告诉我们原因所在。克兰注意到,在全球范围内,以著名的《纽约时报》为代表的诸多报刊都经常用巴别塔来隐喻新的传播技术,新闻媒体似乎对巴别塔有着异乎寻常的依附性,因此他总结道:“不论好歹我们都需要巴别塔。当奇怪的语言不可避免,不同的语言赖以发声的渠道持续增长的时候,语言多样性的喧嚣就不会终止。不论我们将被潮涌般的喧闹声震聋,为我们雷霆般的喧哗感到无比的骄傲,还是得到精神上祝福的回报,都是诠释的问题。没有巴别塔,我们就不知道怎样思考。”^②

的确,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特别是互联网的兴起,利弊祸福都空前地逼迫着人们的思考。在这个梦想和恐惧都臻极点的时代,从话语的角度来说,惯常的语汇已跟不上事物日新月异的变幻,“不可想象”、“瞠目结舌”、“无言”、“失语”等主导了日常叙事,唯“巴别塔”倒是成了这个时代最恰当的象征,从而极大地缓解了人们言说的困窘。然而,有些尴尬的是,有了巴别塔,有时我们更不知道怎样思

① Samantha du Raeno, ‘Boxes and the New Babel’.

② Janathan Crane, ‘The tower of Babel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Image of the 20th Century (and the End of the Millennium) in Literature, Media, and Society in March 2000 in Colorado Springs. <<http://towerofbabel.391.org/jonathanCrane2.htm>>.

考。就拿电影《巴别塔》来说，尽管在中国各大影院的上座率很高，但正如媒体报道的，“散场时听到最多的还是‘看不懂’”。事实上，就是以英语为母语的观众也反映，至少得看两三遍，才能“若有所悟”。在网络上，也经常看到人们互相指责对方“用‘巴别塔’不当”。巴别塔解放了话语，却造成了理解的障碍。

造成理解困难的主要原因有二，首先，巴别塔的内涵太丰富，无所不包。美国德鲁神学院著名的旧约教授费维尔写道：“巴别塔是西方社会的一个文化征象（Icon）。语言理论、哲学、政治学、伦理学，建筑革新、技术批评，帝国视域，抨击都市化，后现代生活形象，种族分化和隔离的论争，谴责人类傲慢都诉诸巴别塔，以获得象征性支持和庇护。”^①而且，“就它的语言和背景而言，故事的普遍意义是明显的。它是关于‘遍地’和‘亚当的子孙’的故事。它涉及到人类文化的普遍经验：出于生存的理由选择群居；它涉及到一般人类情感：惧怕不为人知；它涉及到普通的人类欲望：拥有一个身份和自我空间，创造工艺品以象征那身份和空间，把想象中的作品付诸时间，以可见的结构见证一个社区的存在和在世界里创造某种差异的能力”。^②

其次，巴别塔内涵呈现出鲜明的对立性。按照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观点，意义是在差异中形成的，因此对立本是概念最基本的结构方式，换句话说任何词的“意思”都包含着对立的两种。语句同样具有双重内涵，即任何语句都既可正说，也可反说，此即俗谚所谓“人嘴两层皮，翻来覆去都可以”。只是在历史的选择中，出于言说的确定性，绝大多数词语的内涵都逐渐单一化了。可是巴别塔的内涵却得到了最“全面”的发展，一方面，巴别塔象征着人类认识和科技的进步，象征着民族语言和国家的形成，象征着对至善（上帝）的执著追求，并承载了人类渴望语言统一、建立美好社会的梦想；另一方面，巴别塔又象征着人类追求至善的不可能，象征着人类的骄傲，上帝的惩罚，象征着语言的混乱，人心的隔阂，世界的分裂。显然，

① D. N. Fewell, ‘Building Babel’, *Postmodern Interpretations of the Bible: A Reader*, edited by A. K. M. Adam. Missouri: Chalice Press, 2001, p. 1.

② D. N. Fewell, ‘Building Babel’, *Postmodern Interpretations of the Bible: A Reader*, p. 7.

巴别塔内涵之丰富复杂绝非三言两语所能理清，数千年来的积淀也许只有在历史还原式的展开中才能略窥一二。

就渊源而言，不论巴别塔的内涵有多么丰富复杂，最初也只不过是座塔，问题只是在于：这座衍生出了如此丰富“词”义的“物”到底在什么地方？古老的巴比伦至今也许仍是最好的答案。早在公元前三千多年前，巴比伦文明就已经兴盛于西亚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是人类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尽管绝大多数人是通过《圣经》才知道巴别塔的，而且也从没有确凿的材料证明两者是相同的，但自巴别塔成为人们思考对象的那一刻起，就和“巴比伦”难解难分了。这不仅仅是因为两个概念存在着语源学上的相似，^①更因为辉煌的巴比伦的确建有许多雄伟壮观的塔。据古希腊历史之父希罗多德(Herodotus, 公元前484—425)记载，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确有座伟大的巴比伦城，城墙坚固，里面建有旋梯型通天巨塔，以作神庙之用。《圣经》中同样留下了许多关于雄伟的“大城”巴比伦的描述。而现代考古学则似乎印证了希罗多德的记录，在已经破译的巴比伦文明留下的泥板文书和碑铭中，多次提到巨型塔的建造。随着历史文献的日渐丰富，在考古学家的想象中，一座通天塔赫然复现在广袤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光辉灿烂，极其壮美，象征着人类文明的高度发展和无穷的创造力。千百年来，在想象的关联中，巴比伦塔连同古老辉煌的巴比伦文明一起，早已历史地融进了巴别塔概念，可以说，巴比伦塔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巴别塔征象的物质内容，即“象”的层面，是巴别塔形式美的载体。

巴别塔最基本的象征意义是在犹太文化中形成的。犹太民族同巴比伦人一样古老，也创立了人类最早的文明之一，约在公元前十世纪大卫王时代有过短暂的辉煌，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王不仅因智慧也因建造了富丽堂皇的宫殿而名扬后世。但除此之外，犹太人就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他们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像巴比伦人那样建造起通天塔，所罗门的宫殿也只是昙花一现，圣城耶路撒冷始终是一副破败的景象。变动不居的环境迫使犹太人生存智慧的

^① “巴比伦”古希腊语为“*Babylōn*”，阿卡得语为“bab-ili”，希伯来语为“*babel*”。汉语“和合本”《圣经》中，“巴比伦”和“巴别”有时通译。

取向不是物质,而是精神,这也决定了犹太文化的独特性:精神上的优越感和浓厚的道德说教气质。在巴比伦语境中,历史很容易就忽略了与塔相关的一切悲哀和不幸,而突出了塔的壮美——创造之美。然而,在犹太语境中,道德上的善与恶取代了审美的观照,成了诠释巴别塔的主要维度。

也正是在犹太语境中,“塔”超越了具体的对象物,而生成了经典文本“巴别塔故事”。比起实物来,巴别塔故事拓展了更广阔的诠释空间。作为源文本,巴别塔故事自身结构也不严谨,如:人类建造巴别塔为自己扬名何错之有?上帝既然是无所不能的又何必惧怕人类的成就呢?等等。但是,用现代逻辑来考量古老的文本显然是不妥的。事实是,正由于诸多“不合理之处”的存在,才使得文本获得了巨大的开放性和生命力。巴别塔故事出现在《创世记》中,此后《旧约》再也没有提起过,但在犹太专事讲解经书的教师拉比(Rabbi)的诠释传统中,很快就生成了第二文本——巴别塔故事被具体化、道德化。盖言之有三:第一,建塔者是邪恶的。建塔者的祖先被追溯到了第一个杀人者该隐(Cain)和大洪水之后第一个罪人、亵渎了父亲挪亚的含(Ham),含的孙子宁录(Nimrod)则成了建造巴别塔的首领。第二,塔是罪恶的。既然塔是邪恶者建造的,那么就被打上了恶的烙印,应被摧毁。第三,惩罚是应得的。这已经是人类第四次犯罪了(前三次分别是:偷吃善恶果、杀人、神子和人女乱淫),面对屡教不改的人类,上帝的惩罚是变乱语言。前几次惩罚之后上帝都赐予了恩典,唯有这次没有任何恩典。语言变乱的惩罚显然是最重的,但人类罪有应得。

巴别塔故事于是成了罪与罚的故事,值得一提的是,这罪不是别的而是骄傲之罪。《创世记》中的宁录建立了丰功伟绩,应该是古代理想的帝王形象,在犹太语境中为什么就成了骄傲的代表了呢?从人性的角度来说,成就和骄傲经常相伴随,因而宁录的骄傲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骄傲的由来显然还有其他现实根源。犹太人在流徙的过程中饱受异族人的欺凌,更有过作“巴比伦之囚”的惨痛经历,对以巴比伦人为代表的异族深恶痛绝。《旧约》经常提到巴比伦,称之为“大城”,虽依然被描述得雄伟壮观,但已不是审美的对象,而是道德上恶的象征。犹太人骂巴比伦城为“大妓女”,对之进

行了无情的诅咒，用词之恶毒可谓无所不用其极。有趣的是，犹太人诅咒巴比伦等异族人的理由，主要不是因为自身受到了残酷的迫害，而是这些异族人无视上帝的骄傲。很显然，犹太人尽管处于被压迫的地位，但在精神上并不觉得低人一等，相反他们一直以上帝的选民自居，不自觉地就在俗世代表上帝扮演起了道德审判者的角色，至于皮肉之苦则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了。而宁录的伟业同巴比伦的辉煌，巴别塔的“塔顶通天”同雄伟的大城巴比伦都是可以对号入座的，“我们可以视巴别塔故事为犹太人对他们在巴比伦时所受遭遇的解释，只不过被投射到所有人仍是统一体的远古时期。塔顶通天的城象征着统一政治、文化、宗教的强权。散居在外的犹太人认识到，这个计划是他们的巴比伦压迫者害怕失去霸权而作的一次绝望的努力”。^①于是，异族人的骄傲及神的惩罚就成了巴别塔最核心的象征意义。

严格来说，巴别塔真正被重视是基督教兴起以后的事，正是在基督教语境中，巴别塔的内涵才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基督教脱胎于犹太教，在宗教形式上有明显的继承性，但在教义上差别却很大。犹太教重视的是原罪和惩罚，基督教的核心教义则是创世和救赎。创世说源自犹太教，救赎思想则主要是希伯来文化同古希腊文化交融后的产物。

流浪的犹太人绝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寻找家园的状态，受尽了外族的欺凌。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后，旷野里的四十年也许是最具代表性也是最困难的时期，除了抗击外族，维持生存，还要统一民心，防止内部的分裂。在漫长的流徙过程中，为了在残酷的环境里生存下去，就必须保持种族的团结，严厉的法令是完全必要的，《摩西五经》因之应运而生。在行使法令功能的经书面前，个人是绝不允许有质疑权力的，因为任何个人的理性思考都是危险的，个人只能盲目服从。“希伯来经书”(Hebrew Scripture)^②中的上帝一再宣

^① Hinne Wagenaar, ‘Babel, Jerusalem and Kumba: Missiological Reflections on Genesis 11: 1–11: 9 and Acts 2: 1–2: 13’,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Mission*, Vol. X CII No. 366.

^② 早期犹太教会堂中所使用经书的总称，其中的一部分在公元前二世纪左右被编订成了最初的《旧约》。

戒：“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出埃及记》21：24；《利未记》24：20；《申命记》19：21），正是严刑峻法的象征。与此同时，作为对立面的“人”就只能是罪与罚的对象，于是，就一再有罪人被残忍地用石头砸死。相反，古希腊文化的主导精神则是人本主义的。古希腊神话中的诸神都具有人的性格，而且崇尚智慧。诸神在处理人类问题上往往相互矛盾，因此对人类命运起决定作用的更多的是人自身的力量。古希腊哲人们尽管仍然崇拜神，但却强调对人自身的认识，强调“人是万物的尺度”。

当罪与罚的犹太思想遇到人本主义的古希腊文化的时候，就形成了全新的救赎思想——把人从神的惩罚中赎出来。救赎思想显然不见于古希腊文化，同样，希伯来文化中虽有罪，有罚，有拯救，但也没有救赎。《旧约》中的耶和华是不可见、不可说的，而且如前所述，他高高在上，冷酷无情，睚眦必报。耶和华是特定环境中的产物，象征着严厉的规定性，在这样一种规定性里人完全被否定。对于一个人化了的神来说这种性格是不可理喻的，但作为一种规定性来说，却又是完全合理的。这种规定性的内涵是：人是有罪的，必须接受惩罚，当然，上帝可以施恩缓减判罚，这就是恩典（Grace）。恩典显然不是救赎，因为前者减轻的是罚，罪没有变，这意味着无论多大的恩典，人永远回不到伊甸园；而后者减轻的是罪，罪没了，自然也就不存在罚了，这意味着通过自身的努力还可以变成像亚当夏娃一样纯洁的人，也就还可以回到伊甸园。

但既然是“赎”就需要有代价，而且把人从那么深重的罪中赎出来，肯定需要很高的代价。那么，谁能付出这样的代价呢？换句话说，谁有这样的资格呢？上帝作为执行惩罚的主体，自然不可能又是救赎者，尽管差不多每次惩罚过后他总是能够施行一定程度的恩典。另一方面，按照希伯来人的思想，人是有罪的，而且犯的是原罪，也即是说一出生就是有罪的，不存在纯洁的人，所以人没有资格救赎自身。救赎主体因而只能是介于上帝和人之间的人格神，于是耶稣基督应运而生，而其被钉十字架也因而是注定了的。耶稣基督以自己的鲜血为代价赎了众人的罪，十字架就是永恒的见证，从此之后人的行为才具有了积极的意义，自我救赎也才有可能。

救赎思想赋予巴别塔以全新的象征意义。诠释的重心不再是